

在普洛克拉斯堤之床上的青年需要

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
社工系講師 邵家臻先生



每個人心中都有張「普洛克拉斯堤之床」。

普洛克拉斯堤(Procrustes)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小城邦國王。他最出名之處，在於他的變態和殘忍。普洛克拉斯堤表面熱情好客，但待客之道卻別樹一格：他先誘引旅者進門，饗以盛宴，挽留過夜，要他們睡在一張特別的床上。他希望這張床完全符合客人身長，因此用利斧把太高的人雙腿截斷，把太矮的人身體拉長。結果這看上去「剛剛好」的匹配，其實是經過幾許的「削足適履」、「煎皮拆骨」、「搓圓捏扁」酷刑的結果。故事還有個更令人髮指的版本：普洛克拉斯堤其實有一大一小兩張床，是他故意讓矮人睡大床，讓高人睡小床。「普洛克拉斯堤之床」(The Bed of Procrustes)之所以成為一個令人忐忑意象，因為它不僅是諸個殘酷童話故事之一，而是它儼如現代文明危機的一個縮影——身為知識有限的人類，在我們面對沒有觀察到、未可知的事物時，會把世界和生活硬生生擠進簡單的框架中，再配上特別打造的修辭和悉心包裝的敘事，藉以消除內心焦慮。問題是，焦慮儘管消除了，但一些可能更嚴重的後遺症又衍生。「普洛克拉斯堤之床」輕則令我們未能認真認識眼前的世界，重則使我們成為壓抑真相的共謀而不自知。

眾愚成智抑或眾智成愚

現代文明就是如此這般的自以為是。它實際上卻在將本來千變萬化的人類行為反過來硬塞在「框架」之中——以人來適應科技，適應疾病，適應政治目的和適應經濟模式，而不是改變這些東西來方便人類。我們發明疾病來銷售更多藥物；我們製造需要來促銷產品；我們設計狹小的單位然後告訴自己其實這種鑽石形設計更適合都市人生活；我們巧言令色，說「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一九八四)，而新近的版本即是「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來接受「認命不抗命」、「投降作投票」。這「普洛克拉斯堤之床」在未來的日子，只會嫌少，不會嫌多。它不會使眾愚成智。它只會使眾智成愚。

如何處理每個人心目中的「普洛克拉斯堤之床」？這恐怕不是《我們為甚麼會犯錯？》(Being Wrong: Adventures in the Margin of Error)可以處理。雖然作者Kathryn Schulz提出「錯誤學」，為錯誤說好話，認為錯誤也有作用，但她將「我們的感官」和「我們的大腦」作錯誤的原委，這未免將「普洛克拉斯堤之床」視為個人問題，而無視這個社會如何生產、複製、延續「普洛克拉斯堤之床」。

「對青年需要的誤認和誤判」是個偌大的黑箱

不如乾脆這樣認為，「對青年需要的誤認和誤判」是個偌大的黑箱，當中涉及「誰在誤解、誤判誰？」、「他們是誰？」、「他們有多少人？」、「他們社會位置(Social Status)如何？」、「青年需要的誤認和誤判」的問題出在哪裡？是可以避免的一樁意外嗎？還是個在「成年霸權主義」下的正常結果？甚至是種明知故犯？這種「成年霸權主義」不是一開始就站在「關愛青年」的對立面上，反而是「以關愛青年之名」而進行的文化宰制。於是乎，一個偌大的黑箱就是個不大準確的說法，而應說它是一組黑箱，由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黑箱組成，而在個別的黑箱中，則有著各式各樣意識形態、利益關係、行動模式、知識與權力網絡，彼此不斷拉扯、拉鋸，使「對青年需要的誤認和誤判」遠遠無法一言以蔽之。

作為一個青年工作者，對圍繞著青年的負面論述，總是有所提防，甚至對李敖還是青年的時候所寫的文章〈老人與棒子〉，特別鍾愛。他說：「首先不必談如何使青年接上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們交出這一棒。站在一個青年人的立場，我所關心的是：第一、從感覺上面說，老年人肯不肯交出這一棒？第二、從技巧上面說，老年人會不會交出這一棒？第三、從交棒本身來說，老年人交出來的是一枝甚麼棒？我擔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來，反倒可能在青年人頭上打一棒！」。「老人的棒子」像是揮之不去，分別只是粗暴、張揚、直接還是細緻、難纏、曖昧、迂迴而已。

於我而言，「對青年需要的誤認和誤判」就是將社會需要(Social Needs)化約成青年需要(Youth Needs)，再將青年需要化約成青年問題(Youth Problem)，之後將青年問題福利化(Welfarization of Youth Problem)，即以福利資源提供的多寡作為解釋和解決青年問題的主軸，而這都跟非政治化工程(de-politicization project)有關。要達到這種效果，沒有青年本質化(essentialization)和同質化(homogenization)的策略配合，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在青年約章裡頭，有許多關於青年需要的豪情壯語：「青年是社會寶貴的資產，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在成長的道路上，青年需要關懷和鼓勵，使他們發展為成熟、有責任感、有貢獻的公民。」在青年事務委員會的研究資料庫中多次提及：「青少年十分需要愛護，需要在一個關懷他們的社會中成長，這樣他們才能成為一個處處關懷別人和富有責任感的人。我們建議必須藉著鼓勵社會人士，尤其是青少年參與義務工作，從而提倡這種關懷別人的社會風氣。」顯然，青年事務委員會是向人類成長心理學學習的，

甚麼「青少年階段為人格發展中重要的階段，其發展任務是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即自我認識、自我接納及要求別人認同，建立自我身份。」總是這麼鏗鏘有力，歷久常新。不過，我總認為「青年」、「青年需要」等概念不是存在於真空(Vacuum)之中，也不是自有永有。年青人能否自我認同、自我認識、自我接納及建立自我身份，均與一大堆跟青年生活處境以及社會思維脈絡有關。

研究世代，不如研究時代

為甚麼汲汲於青年這世代，不戚戚於我們這時代？匈牙利裔德語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寫於一九二七年的文章〈世代的社會學問題〉(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正好提供了對「世代研究」的逆向思考(Thinking Backwards)。曼海姆認為，世代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為它是我們了解社會如何變化的重要線索。僅僅在同一地理和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足以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共同面對同一歷史及社會處境，並投身參與這個共同的社會困境(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on destiny of this historical and social unit)，意即是，只有當共同面對一個社會困境，並產生了實際聯繫時，彼此萌生出一份「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和認知，才可稱得上是世代，才可稱得上是世代的誕生。自然的生理特徵、同一時間成長、同屬一個階級背景等，統統不是世代定義裏有意義的內容。

曼海姆提醒我們，要分析世代，首要不是從找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通處着手，也不要簡化地在家庭關係裡前輩後輩的概念周旋。這都只會糟蹋了社會學對世代的討論。所謂世代，是以某種對時代的特定回應來定義自身的身份，所以必然要對社會狀態作出判斷，然後才回溯整理一套回應時代的方法，從而思索「誰跟誰屬誰世代」的問題。假如今天，曼海姆在香港，他多會對「我是九一年出生的，我就是九十後；你是六九年出生的，你無法談論九十後」的理解，不屑一顧。畢竟，同齡或出生時間相近，不意味對社會困境有共同理解，更遑論有共同投入。於曼海姆而言，九十後的「共通點」，並未能成為構成定義九十後的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有關九十後的討論，歸根究底乃是社會如何變化的討論。簡言之，研究世代(Generation)，不如研究時代(Age)；研究世代的轉變，其實是為了窺探時代的轉變。那麼，研究青年需要，說穿了就是這個時代的需要吧！

「青年」是個政治概念

「青年」已經是一個尋常到不再起眼的修辭，毋庸再加以解釋，就像常識一樣，是一片沉默無語、聞風不動的靜寂土地，吊詭的是，當「青年」這個修辭愈是常在一般的用法出現，它的意義可能愈是多樣，以致青年一詞成了最普遍、平常又分歧、相悖的典型例子。一般我們稱得上青年的種類有很多，例如是邊緣青年、雙失青年、新移民青年、傑出青年、貧窮青年、青年劇場、青年論壇、青年運動、青年研究、青年服務機構等。我們至少有個印象，就是稱得上是青年的，總是有種共同特徵和類近的意義，但這種特徵又是意會而不可言傳。而不可以言傳的東西又帶點曖昧和分歧，譬如青年是某年齡組群，但轉眼間它又可以是一種社會問題；有時卻成了市場口味和策略；若遇上學術的時候，「青年」又成了一種角度和視點；而在公眾印象中，青年卻經常被指是不成熟、暴風雨、衝動、無知、難辨是非等矮化青少年的能力。

「青年」的意義之所以能夠如此滑動，因為它其實是個政治範疇——政治權力可以隨時隨意定義、限定、規範「青年」，以致「青年」只存在抽象之中——一時是個觀念，一時又只是個幻思(Fantasy)、幻覺(Illusion)、再現(Representation)，而這個被表述的社群(Represented Community)跟「青年」可能已經愈走愈遠了。

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以為，與其問「青年是甚麼」，不如問「青年意味着甚麼」——「青年」這個身份賦予了甚麼特殊文化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對個人、生活、組織、社群產生了甚麼效果。現時主流論述將青年裝置在「不完全」、「非成人」、「邊緣」的他者位置，就是從「不是甚麼」的邏輯，對照出「是甚麼」的意義來。這些站在成年人對立面的青年觀念，成功鞏固了年齡區別的界線，並同時鎖死了青年的角色，成為一種牢不可破的定見(Stereotyping)。社會制度不應從一個人的「歲數年齡」(Calendar Age)來決定對待方式。年齡差異更不能構成年齡不平等的理由。環顧現時許多年齡差異，特別是那些在所謂社會能力、智力、判斷力、抽象思維、責任心、定力、注意力、耐性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平均值差異，往往本身就是年齡壓迫的結果。當壓迫條件消失後，年青人所具有的潛力是未可知的。這一類的年齡解放是揚棄成人對年青人的監督和操控，認為「年青人」本身就是壓迫性的，年青人必須從限制中解放出來，而這就是年青人解放運動。

單一的年齡身份及其暴力

年青人只得「青年」這個身份？當年青人只得「青年」這單一身份時，他們就被視為一個整體。他們的身世背景、生活處境、個性差異、行動理由本來極為懸殊，在經過調查、報導之後，被硬塞在一個共同身份(uniform status)之中，而開始一段共同的命運，接受相似的規訓。福利經濟學家Amartya Sen在《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中，警惕我們要小心「單一身份的暴力」：「堅持人類身份毫無選擇的單一性，哪怕只是一種下意識的觀念，不僅會大大削減我們豐富的人性，而且也使這個世界處於一種一觸即發的狀態，因為單一、別無選擇的身份認同同樣會殺人」。他回顧一九九四年的盧旺達大屠殺，當那些黑人被告知自己是胡圖人，而且「我們憎恨圖西人」的時候，「無知的民眾實際上是被套上了單一而且好鬥的身份，由熟練的劊子手帶領著釀造了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人愛自我標榜，也愛給別人貼標籤，喜歡以局部代替整體。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標示一件物品，通常是為了增加其辨識度。然而，當我們將某人貼上一個負面標籤，並且將其簡化唯一身份的時候，暴力便已經在醞釀。因為別無選擇的單一身份抹殺了人的多元群體特徵與多重忠誠。它像海水一樣，可以將每個族群、每個人圍成一座座孤島，從此孤立無援。Amartya Sen以為：「詆毀他人做法的基礎，一是對他人予以錯誤的描述，二是製造這些是這個可鄙棄的人的唯一身份幻象。」回顧人類歷史，路易十六被殺頭，因為在革命者眼裡他的唯一身份是暴君。猶太人被趕殺，因為在納粹份子那裡他們的唯一身份是猶太人。同樣，在中國盛行階級鬥爭的年代裏，當一個人因為「地主」、「黑五類」、

「階級敵人」等別無選擇的單一身份而被批鬥時，他身上所有其他關係或者身份屬性便立刻消失。此時，他不再是一位父親、兒子或者丈夫，不再是鄉親鄰里，甚至也不再是「人」。他只是「寄生蟲」、「剝削者」、「偉大事業的破壞者」等污名的集合體，其他歸屬關係的消失切斷了他應得的一切人道救濟與同情心。

常言道，平庸的心靈從諸事中尋找共同點；精緻的心靈是推敲箇中差異。不如「拒絕我們是誰」，寧願著眼於生命的曼妙，年青人有自己的質感，或濃或淡，或韌或暢。有些生命像文章結構，起承轉合，該凸的凸，該仄的仄，該緊的緊，該疏的疏；有些的音調、凝視、行走則飽含憂思，像條河流，或靜默存在或不絕流竄。要傾聽一個人的生命之旅，殊不容易。這種不易，是因為你若無法投射自己的情感，便輕若身外。

總結：在大海裡渴死

哲學家尼采曾經說過：「在大海裏渴死，是非常可怕的事。」這實在是非常精妙的譬喻。人在大海裡被海水環繞，但偏偏此水不同彼水，救不了人的乾涸，最後要活活渴死。這種「在大海裏渴死」的譬喻像當下的「青年需要」，它被政府、財團、媒體、大學、政團、聲音包圍，儘管是眾聲喧嘩，但卻不斷被本質化(essentialization)和同質化(homogenization)，接著，要不矮化年青人的公民權利，要不就名正言順地向年青人宣戰(war on kids)。例如最近的「多了人移民，不是因為怕共產黨，而是怕了年輕人」、「點樣放心二十年後將香港交俾呢班人去管呢？」、「放棄那些在政制層面走向極端，用犯法手段破壞法治的年輕人」、「大學生輪候公屋是放棄自己」……我們將這些言論理解為植根於「普洛克拉斯堤之床」的大事件，在紛亂的雜音中，找出知識、權力的身影。